

“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

张奎良

“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观和社会经济管理的基本理念，在各个领域里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甚至受到衷心的拥护。那么，哲学又是什么态度？它是否接受“以人为本”呢？这个问题现在未必有一致的答案。十年前，笔者曾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以人为本”的文章，就曾引起争论，被认为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冒犯。（参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2、8、9、12期有关文章）现在虽然理论环境进一步宽松，但是哲学上“本”的问题历来歧见极深，积重难返，看来今天仍有讨论的必要。“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本”的释义上。比起十年前，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观察视角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和转换。

一、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世界之本

哲学承不承认“以人为本”，这要从“本”的含义说起。哲学上的“本”首先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指的是世界的基础和本原。在哲学史上，物、心、神都曾被当作“本”，并由此而演化为唯物、唯心、神学等流派。在马克思以前，本体论不仅是一种观点和流派，而且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任何一种哲学都必须回答世界的终极本质问题，把本体论作为哲学构成的基本板块。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本体论，与形而上学是同义语。但本体论思维方式具有严重的缺陷，它避开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抽象地追问世界的始基，得出的答案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只是一种思辨的信念，怎么说都行，不具有公认的确定性。因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的矛头一开始就指向本体论，把对世界终极本质的追问回归到人及其实践中。

马克思深刻地意识到，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是有意義的。人是智慧动物，从不满足于对事物的感性直观；超越感觉经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深层理解是人之为人的本性。本体论对世界本质的终极追问恰恰与人的形上诉求相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不满足于既有的生存状态，追寻世界的理想之“本”，这不仅促进了人在主观与客观、此岸与彼岸、本质与现象、感觉与思想等二元分立领域对立的意识和觉醒，而且具有批判现实的作用。问题在于怎样理解和确认世界之“本”。

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本体论都是与人无涉的，它们形态各异，内容不同，但有其共同点，即不理解世界的属人性，都是在人的实践和创造之外去设定世界的终极原因和构成。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把对世界之本的追寻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马克思首先确定了世界的存在前提，即我们所说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而不是离开人的虚妄和抽象的世界，讨论这种世界之本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曾批评费尔巴哈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至于“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同上，第77页）。所以，我们必须把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讨论的基点，去追寻什么是现实世界之本。

当我们把视角移向生活世界，人作为世界之本的意识就立即被召唤出来了。人的生活世界包含三个层面，即自然界、人类精神和精神世界，它们无一不是人类实践和创造的结果。马克思说过，自然是人化的自然，“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割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5页）。“在人类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同上，第307页）。所以人是自然界的奥秘所在，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价值、需求重塑了自然界，“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同上，第336页），只有人才是自然界的真正之本。而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人的集合，社会之本无疑是人自身，因为人以生产实践而生存自立，而“人本身是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同上，第300页）。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就是社会关系，“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6页）。所以马克思又说：“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人不仅是自然界之本，而且也是社会之本。而精神和意识本身就是人高度进化的产物，是人的思维的结晶，它以人的存在为载体，自然也是以人为本的。这样，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就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颠覆：他不仅对旧唯物主义的“人是自然界产物”的历史传统补充以“人化自然”和“人化世界”的崭新结论，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置人于“本”的地位，而且把对人的理解建立在崭新的实践基础上。在马克思以前，人本思潮并不乏见，费尔巴哈就是一个著名的人本唯物主义者。但他用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人，和18世纪旧唯物主义者一样，把人仅仅看成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不理解人的实践和感性活动在自然界和人的生成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同上，第77-78页）

对于现实世界来说，人是本，而对于人来说，实践和感性活动是本。没有实践就不会生成人，因而也就不会有现实的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同上，第77页）所以，马克思不仅为现实世界找到了真正的人本基础，而且还对人作了科学的解说，指出实践是包括人在内的全部世界的根基所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而是经过划时代哲学革命变革而创生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主体，没有作为生命个体和生命需求而存在的人，也就不会有人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是对世界本质的正确认识和如实反映，它对一切时代、一切社会都是天经地义、至高无上的。社会主义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首肯和认同。

二、人是价值论意义上之本

“以人为本”除具有本体论意义还有价值论的意义，即指谓人本身尊贵和重要，要求本着人的价值和需求来决策和行事，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大抵相近。

人本主义是极其重要的哲学思潮，它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近现代的哲学发展史中；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续文和展开。既然已经确认人是世界之本，那么，如何对待人这个“本”呢？这正是人本主义所要研究的课题，具有显明的价值意义。所以从逻辑上说，如何对待人本主义是探讨“以人为本”哲学意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本主义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从价值意义上来表征对人的重视和善待，这种思潮也相当普遍。任何一个时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依赖于民生问题的妥善安排和解决，没有对人的起码的关照，任何统治和管理都维持不了。所以，不需要什么崇高境界，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也会形成和产生价值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原本是战国时代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的治国术，其意是说，只有把人的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本理国固”，最后达到称王称霸的目的。这里虽有明显的工具性，但瑕不掩瑜，毕竟是对人的善待和重视其意愿的一种表达，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着这条思路传承下来的。因此，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说教，同时也具有深厚的人本主义意蕴。但是，比较起来，真正以哲学形态系统阐发的人本主义思想还是产生于西欧。15、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文主义运动，它把斗争矛头直指宗教神学和封建等级制度，反对神道，尊崇人道，批判愚昧，倡导理性，轻蔑信仰和彼岸，重视尘世和此岸，把人从“醉醺醺”的天国梦中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来。这场运动以其理性和人道主义的内核而成为人本主义思潮的肇始，经过休谟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锤炼和提高，到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代表，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形态的人本主义思潮。康德重视人的生存和价值，强调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并要人为自然立法，这在他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费尔巴哈虽然不理解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但他推崇人，把人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和哲学的最高对象，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尤其是费尔巴哈和他同时代人对宗教的批判，揭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实质，不仅把人从宗教那里夺了回来，而且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这就使人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有资格和自信为争取自己的尊严和权益而斗争。

到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在形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着资本主义科技理性过度张扬而

造成的人高度异化的事实，人本主义开始与理性主义分道扬镳，采取了非理性主义形态。从19世纪中叶起，以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们就开始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挑战。他们不满于对普遍人性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一般颂扬，要求转向人的个体生命、本性和本能，认为这是人的本真存在。他们强调人是包括肉体、活动、意志、情感在内的完整的存在，传统哲学的弊病就在于忘记了人，必须使哲学向人和人的交往及全面性回归。20世纪后在德、法等国出现的一批人本主义思想家继承了先辈们的思想，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急剧加深的背景下，把人本主义思潮进一步推向系统化和完整化。特别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命名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见解深刻，著作众多，影响巨大。无论是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学派，他们之间虽有分歧，但都表现了对人的命运的关切和对人的自由、尊严的追求。他们与其前辈不同，不再简单地拒斥科学和理性，而是企图将理性和非理性结合起来，给人以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运用其学说中，使其人本主义思想更具先进性和深刻性。他们批判自然辩证法是为了突出人的中心和主体地位；他们强调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的事实，从而为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他们超越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简单化，把人的解放看作既是政治经济上的革命，又是包括意识、心理、需要、本能、文化等方面在内的“总体革命”。这样，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就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整合了既有的人学思想，与科学主义思潮共同成为现时代的哲学主流派别之一。

怎样看待现代人本主义思潮？这在中国一直是存有重大争议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只讲阶级不讲人，谈人尚且变色，自然也就不敢把人和“本”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一切人本思潮概加拒斥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就连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体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阔视野，正本清源，不仅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从过去被扭曲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而且对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也逐渐转向客观公正的态度，开始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向度来体验其意义和价值。人作为世界之本，其尊严和价值应不应该受到尊重？人本主义在这方面的诉求应该说是顺情达理的，这也是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理论干扰影响对人本主义哲学的认同，所谓的代价论就是一例。马克思当年面对英国对印度殖民侵略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后果，曾说过：“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欢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6页）像这种情况，即社会进步伴之以人的价值贬损，这几乎成了历史的常例。马克思曾问道：“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同上，第771页）马克思的这些话似乎可以为代价论提供论据，但仔细品味也不难看出，这种代价规律只适用于私有制社会，而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规律并不适用，马克思晚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就证实了这一点。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通信及其它手稿中指出，当年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可以付出人的价值的代价，现在，当资本主义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的时候，为了“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3、129、431页），充分体现和高扬人的价值，东方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的这个设想揭示了代价论的局限和相对意义，把人的生存价值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才断然否定“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构想，体现了对人本主义的认同。

人本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人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要求尊重人的生命、情感、意志、本能的意义和价值，把人当作世界的本真和最高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在基本目标上一直与人本主义相契合。邓小平首先举起人学批判的旗帜，平反冤假错案，恢复人的价值和尊严，从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人的侮辱和摧残。紧接着邓小平发动了对“四人帮”散布的贫穷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中国用改革开放和使人民富裕起来的事实体现了人本主义的诉求，证实了人本主义理论虽然重要，但是生活之树常青，实践比理论更重要。说到底，人本主义也不过是追求人的生存意义而已。由邓小平开创的旨在重视和高扬人的生存和价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继续拓展。不管人们怎样认识和评说，人本主义作为人的理想和发展目标在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地被实现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结合起来，站在时代高度去把握和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对人和人的权益理解的细化和深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新的科学发展观，并在“三农”、“低保”和下岗工人再就业等民生问题上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以崭新的面貌和气势确保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人本主义有价值的思想融入到“以人为本”中，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能够承前启后，集中一切人学思想的精华，实现了人学学说的一次历史性的整合。

三、人是终极追求意义上之本

“本”还有终极追求之意，就这一点来说，“以人为本”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相吻合。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是马克思人学思想追求的最高殿堂，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可以跃上的平台，那么，这就是最基本的实现条件。过去虽然也熟知马克思的一些著名话语，如《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自由人联合体”；《资本论》手稿中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是人自身发展的第三阶段；《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等等，但总是觉得这些论述都是关涉遥远未来的事情，没有现实意义，所以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的事实证明，人是一切发展的关键，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没有现代化素质的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现代化。严酷的事实迫使各国不得不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人才问题尤为迫切。

解决人才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人才观。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人被高度异化和肢解的事实，提出了消灭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课题。本来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没有分工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分工不是自愿而是强制的，那么分工本身就是对人的自由的剥夺和对兴趣与才能的压抑，这种分工对人当然是一种异化，是只有私有制社会才会产生和出现的。马克思说：“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获得产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所以，马克思对分工的批评并不只是针对分工本身，而是主要着眼于人在分工中所受到的强制和异化。如马克思所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同上，第85页）处于这种分工中的人是异化的人，是不自由的人，共产主义要消除异化当然要消灭这种强制性的分工，由此马克思才转向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人的全面发展有双重含义，一是就个人而言，涉及个人的全面素质，即人人都应该有健康的体魄、广博的知识、专业的技能、道德的涵养和善良的品格，在德智体美等基本方面具备较高的素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体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又为社会所需求和接受。二是指全社会对所需人才的整体布局，全面、协调地培养和配置社会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只有这两方面的有机配合才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部要义。

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人的全面发展的举措才刚刚起步。“以人为本”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基础，只有以此为原点才能迈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坚实步伐。因为人的全面发展首先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人为什么要全面发展，有什么资格全面发展。这就涉及到“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合法性奠基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消除异化和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本性要求与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基于人是世界之本，而且还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平等的关系，个体全面发展的理由就是全体人普遍发展的根据。马克思说：“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

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8页）所以，人的全面发展是普遍的权利和总体性概念，“以人为本”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底线和基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贯彻“以人为本”是个巨大的实践工程，当前我国正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解决民生问题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就为人的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深入实践和具体落实，我国人民的全面素质必将大大提高，我国的社会发展也必将出现新的腾飞局面。

参考文献

《邓小平文选》，1983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1972年、1980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黄慧珍（《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